

古典诗词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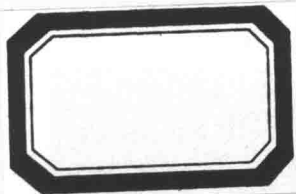
楚辞选译

李山

选译

2.3
7.2





李山

选译

楚辞选译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楚辞选译/李山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326-7

I. 楚… II. 李… III. ①楚辞-选集②楚辞-注释 IV.
I2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4056 号

书 名 楚辞选译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李 山 选译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½ 字数 136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326-7/I·566

定 价 12.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2 楚辞选译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有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

言

楚辞是《诗经》之后崛起于战国时期楚地的新诗体。

楚辞的特点,可借宋人黄伯思的话来概括:“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所谓“楚语”,楚辞作品中确实使用着大量与《诗经》乃至诸子迥然有别的词语,如经常出现一句开头的“羌”、“謇”、“纷”,用于句尾的“些”、“只”,用以表达失意的“侘傺”,和表示君王的“灵修”、“荃”等;“兮”字虽然《诗经》也有,但绝不像在《离骚》等篇章那样用在句子中间,起着不可或缺的舒缓节奏、凝重语气的作用。继而是“楚声”,首先应指楚语与北方语不同的声调、发音;以南楚方音诵读楚词,是一项专门技艺,汉代有一位九江被(pī)公,善用楚声诵楚辞(《汉书·王褒传》),据载这项技艺一直延续到隋唐之际。“楚声”还有着更为重要的含义,那就是楚地的音乐。

我们知道,《诗经》是四言诗体,而楚辞则六言为主,这都不是平常说话的语式,而是音乐形态下歌唱的句法。楚地的音乐曲调,早已随风飘散,楚乐十分发达则毫无疑问。说到这里,人们马上会想到近年出土于楚地的编钟。这只是一方面,音乐发达还意味着音乐形式的繁富。楚辞作品结尾部分总有“乱”辞,即尾声,也就是

乐曲的结束曲。《诗经》也有“乱”^①，但两相比较，远没有楚辞这样发育良好。此外还多出“少歌”和“倡”。王逸对“少歌”这样解释：“小吟讴谣，以乐志也”，又说“倡”是“起倡发声，造新曲也”（均见《楚辞章句》）。在一部整体的歌唱中，有大声的依着乐曲的歌唱，有小声的低吟，还有即兴的新曲，楚辞声腔艺术，是如何的发达！楚辞能跨越《诗经》的四言格局，而在句法上有所拓展，首先应当归功于楚地的音乐。至于“纪楚地”和“名楚物”，屈原作品特别是记录诗人行迹的《九章》，有许多楚国地名，如“岑阳”、“溱浦”等等，对了解诗人生活至关重要；而“名楚物”一项最突出的是以《离骚》为代表的“香草”系统。南楚之地，人杰“草”灵，记载中楚国早先向周王室的进贡之物，就是祭神用的灵草。于此，对诗用蕙、菝、兰、衡等象征“美人”的修身、用“荃”来指代君主，可思之过半了。读楚辞，扑面而来是阵阵发自楚地的香草气息。

综上所述，《楚辞》是带有浓郁的南楚地域色彩的诗歌新体裁，较诸《诗经》，它的句子要长，节奏要舒缓，篇幅更大，风格更华美。也许更为重要的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在作品中所显示出的“深固难徙”的楚国情怀，使作品中充溢的楚语、楚声、楚物、楚地，才具有了那样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给《离骚》等屈宋作品冠以“楚辞”之名的，是西汉人。屈、宋之后，模拟屈原作品或以屈原身世为题材的楚辞作品不少，到西汉后期的成帝时期，学者刘向在整理皇家图书时，把屈、宋及汉代东方朔、庄忌、淮南小山、王褒和他自己的作品编辑在一起，起名“楚辞”。有趣的是，编辑、注解楚辞的人把自己的作品附在集子的最

① 《国语·鲁语下》载闵马父之言说：“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辑之乱”云云，表明《诗经》也有“乱”辞。

后,几乎成了一个惯例,刘向如此,作《楚辞章句》的王逸如此,到明末清初王夫之作《楚辞通释》时还是如此!

楚辞文学的创始人是屈原。关于这位伟大诗人的生平事迹,后人知道的并不是很多,还存在着不少的疑问。依据《史记·屈原列传》和刘向《新序·节士》及《离骚》、《九章》等文献,大体可做如下的描述:他与楚国君主同出一源,都是半姓贵族,并因这样的出身,做过负责贵族子弟教育之职的三闾大夫。楚怀王早期曾对屈原十分信任,“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屈原列传》)。《离骚》等作品显示,屈原有强烈的以明立法度、富国强兵为内容的“美政”理想,而怀王也曾任命他起草过改革政治的宪令。然而这一切都无果而终。

楚怀王在位(前328—前299年)的三十年期间,中国社会已进入混战激烈的战国中期,楚国也处在盛衰之际。当时的历史大事是所谓的“约纵连横”(约纵是指联合东方六国抵抗秦,连横则是秦联合东方某一国家以削弱其他国家),楚怀王早期颇能奋发图强,曾是“约纵”阵营的主要人物,联合齐等东方国家抵抗秦国,还做过“约纵”的纵长。但他终归是一个难成大事的君主,听信谗言,容易上当受骗。屈原在朝有位“同列”,史书上称之为上官大夫,很嫉妒屈原的作为,与靳尚和怀王幼子子兰等结成黑暗集团(屈原称之为“党人”),向怀王进谗言,说王派屈原起草宪令,每一令出,屈原都骄傲自夸:“非我莫能。”无根之言止于智者,不幸的是,上官的这点小伎俩楚怀王照单全信,于是“王怒而疏屈原”。从此,作为政治家屈原成了失败者,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却开始了他惊天地、泣鬼神的创作。《离骚》、《天问》、《九章》等主要作品,都作于遭谗被疏之后的日子里。

屈原被谗,按《史记》的记载,是“不复在位”,即没有了参与大

政的资格,而不是完全被免职,他还作为楚国的使者到过齐国。这是一种说法。稍晚于司马迁的刘向则有另外的说法,《新序·节士》篇说,屈原的被疏远即是被流放,他的出使齐国,是由于怀王的重新起用。屈原在位时,试图有为的楚怀王奉行约纵以制秦的国策;屈原被疏后,楚的国策有重大改变。楚怀王十六年,秦以六百里国土的承诺,要求楚国与齐断交。楚怀王贪图眼前利益,鲁莽地与齐断交后发现自己中了秦人的圈套,于是重新起用屈原与齐恢复关系。综合考虑《史记》和《新序》的记载,应当说,刘向的记载补充了司马迁《史记》的疏忽。司马迁和刘向都说《离骚》作于怀王“怒而疏屈原”之后的一段日子里,《九章·惜往日》中诗人明确地说怀王信谗言而“远迁臣而不思”,与司马迁同时的刘安在其《离骚传》中也说“虽放流,睠顾楚国,不忘欲返”;看来楚怀王的“怒而疏之”,实际就是“放流”。再从《离骚》内容看,诗人写作的主要意图之一,是向怀王表明自己的正直忠诚,其化解君臣间误会、希冀再被任用的心意还是相当明显的。他的这番苦心能得到楚怀王谅解,可能就与当时楚与秦、齐关系的变化有关。有记载显示,“出则接遇宾客”的屈原,是合纵政策的拥护者,随着楚怀王齐、秦政策的摇摆,屈原的命运亦随之沉浮,是不难理解的。不过,楚与齐的关系并未得到长期改善,怀王二十六年,齐联合韩、魏兴兵伐楚。二十八年,齐又与秦、韩、魏三国联合击楚,打败楚军于垂沙,杀其将唐昧。次年秦军再次伐楚,杀两万人。楚之国事一发不可收拾。

被怀王疏远的那段时间里,屈原曾经到过汉北之地,这在《九章·抽思》一篇里有明确的显示,实际就是一段流放生涯。这段流放生活的表现,是理解屈原人格特点的关键。我们知道,在此期间诗人写了《离骚》和《九章》的部分篇章,《离骚》则以浓郁的笔墨表达了诗人难以割舍的故国情思。可是,在那个时代,当大臣被君主

黜职或疏远后，却不一定都像屈原那样，一定要选择留在故国。《左传·宣公元年》记载“晋放其大夫胥甲于卫”，《襄公十九年》又载“放其大夫高止于北燕”。胥甲的去卫，高止的去北燕，都是两人自动离开，而不是君主的安排。也就是说，当受到君主疏远或黜职时，大臣离开故国重新选择自己的前途，并非罕见的事情。就是在楚国又何尝不如此，其大臣因得罪君主而奔走他国的不止一例，所谓“楚材晋用”这一古语，不正说的是这样的现象吗？《离骚》中“去”与“留”的思想矛盾也曾交织着，但诗人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以至于沉江自杀。诗人不寻常的性格于此可见一斑了。

到怀王三十年，屈原又回到郢都。当时，不长记性的楚怀王再次受秦国欺骗，与秦昭王在武关约会，被扣留在咸阳，四年之后死去。据《史记》记载，怀王前往武关时，屈原曾表示反对，说：“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幼子子兰却赞同此事。楚怀王终于死在秦国之后，包括屈原在内的楚国人自然对劝怀王赴会的子兰发出怨恨，子兰“闻之大怒”，并迁怒屈原，伙同上官等人向顷襄王进谗言，“顷襄王怒而迁之”。《史记》记载得很明确，屈原这一次遭受无端打击是“迁之”。这“迁之”之“迁”，字面的意思是贬官削职，实际的操作则是被逐出朝廷。何以见得是削职呢？如果屈原在朝中没有任何职务，他在怀王入秦时的阻止，后来子兰对他的大怒，也都无从谈起了。再者，《史记·屈原列传》记载，诗人自杀前，“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此？”这“被发行吟”的光景，是屈原失去了冠戴，身同庶人的表现。渔父（实际是楚地一位独善其身的隐者）“三闾大夫”云云的发问，正表明诗人的削职为民的遭遇。削职表面上不等于放逐，而屈原实际上是遭受了这样的惩罚。有子兰、上官等一批得势小人在朝中的上下其手，诗人也只有被窜逐他

乡。这都是不上台面的,如今天所谓的“暗箱操作”。司马迁《史记》只写怀王“怒而疏之”,但照刘向的说法却是遭了放逐;顷襄王也只是“怒而迁之”,然而诗人却“被发行吟于泽畔”。两方面貌似龃龉,实际可以互补。

被顷襄王“怒而迁之”后,屈原曾离开郢都东行,飘泊数年之后,又沿着长江、湘、沅之水向西南行。东行和南行的具体情形都难以考究了,历代的学者对此也有种种说法。可以肯定的是,这段时间,诗人继《离骚》之后,又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诗篇,如《九章》中的《涉江》、《哀郢》、《怀沙》、《惜往日》、《悲回风》等。这些感人的篇章,深刻地展示着诗人的思想活动和内心痛苦。前面谈到,《离骚》写作的目的之一,是向怀王表明自己:表明自己的忠诚正直,表明自己难以割舍的故国之心,用汉代刘安的话说,是“系心怀王,不忘欲返,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在后期《九章》的几首诗篇里,虽也有“不忘欲返”,但对象不再是楚王,而是故国;虽也有对党人苟且之俗的痛斥,但也不再是“冀俗之一改”,而是对现实的揭露,是诗人察察之身不受汶汶之污的誓言。

屈原最后死在了汨罗江,是投水自杀的。时间在某一年的初夏,传说更认为是农历的五月初五。端午节本来是一个有关龙的节日,其起源比屈原的时代要悠久得多。但一个古老的节日因诗人之死而有了新的含义,甚而成为纪念诗人的节日,表明了民众对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热爱。

诗人一生活了多长时间?这也是一个难题。《离骚》开始的“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写到了太岁纪年法,一般认为是诗人的自述,可作为推测诗人出生年月的依据。清朝学者开始推算,之后有刘师培、郭沫若等不少学者的工作,公认的一种结

果是浦江清先生的研究,推算屈原生于楚威王元年,即公元前339年的正月十四。屈原死时的年龄多大呢?大约在五十岁左右。楚威王在位十一年,怀王三十年,楚两代王共四十一年,也就是说,楚怀王死去的那一年,屈原四十岁出头。子兰进谗言应在襄王初年,此后据《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归”的说法,他又经历了九年的流放生活。之后又辗转到达湘、沅一带以至最后的汨罗自沉,恐怕又得两三年或更长的时间。这样就可以大体算出诗人的年龄了。

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有宋玉、景差、唐勒等。宋玉作品据《汉书·艺文志》有十六篇,可信的有《九辩》。景差、唐勒作品后世无传,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竹简中有残赋一篇,据研究为唐勒所作。汉代写作楚辞体的人也不少,如贾谊、淮南小山等等。

有关《离骚》等楚辞作品在艺术上的伟大成就,前人论述很多。这里只想谈谈《离骚》等作品在“比兴”上的发展和贡献。“比兴”本来是古人解释《诗经》的术语,将其用之于楚辞作品,从汉代就开始了。“比兴”中的“比”就是打比喻,兴是托物言志;总括地说就是诗人感于外物所发生的联想、想象和象征。《诗经》三百篇中有很多的比兴手法,前人认为《离骚》等继承了这样的艺术手法而加以发扬光大。这可以用例子来说明一下。比兴离不开花鸟虫鱼,《诗经》开篇第一首是《关雎》,曰:“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诗经》的比兴,欲言君子淑女的结合,先唱河洲之鸟。为什么先唱河中雎鸠,而不是别的?那说法就多了。此处我们倒无须一一细说,只要明确河中雎鸠“关关”的鸣叫,不过是歌唱君子淑女成亲的一个引子就可以了。先民在歌唱自己的婚姻生活时,可能是有理有据地去与自然界的事物联系,也可能是天籁触发,信手拈来。无论是有理有据,还是信手拈来,都不能把“关

关雎鸠，在河之洲”，读为君子淑女结婚的具体环境，也就是说，不能理解为男女的成婚是在河的附近进行的。比兴与它所引起的人事，只是一种自由联想，不存在现实的关系。可是，诗人是自由联想，读者也可以承认他的自由联想，却仍然挡不住人们读诗时，将那美好的男女成双，与平缓的沙洲，流淌的河水，与微风中传来的阵阵雎鸠的和谐鸟鸣连接在一起，在头脑中浮现。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比兴之句，只是光秃秃地写男女的成婚，读者就不会有这样的兴致。这便是比兴的妙处。

《离骚》的比兴则另具面目。请看下面的句子：“朝搴阼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薜荔施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这采摘木兰、宿莽，饮餐秋菊、落英的行动，大概没有谁会把它们当成诗人真实的行为，同时这也不是背景或景象的描述。毫无疑问，它们是一种喻示，喻示的是诗人的德性修养。但是修养的这层意思，完全没有说出，是从那一系列的行为中显示出来的。“关关雎鸠”式的比兴是咏物引起人事，物与人事之间是若即若离的，而在《离骚》这里，人事与物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修养德性的事情抽象，不好表达，诗人就用了香草以喻美人，人事完全隐蔽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喻之中了。在《诗经》是比兴与人事参半，在《离骚》这里却只有比兴，人事的活动被隐舍了。《诗经》的比兴是一只风筝，在空中翩翩飘舞，却总有一条线绾在人事的大地上；《离骚》则是一片蒸蒸蔚蔚的云霞。当诗人完全沿着比喻的现象法则驰骋时，他的比兴系统，就不再像《诗经》那样古朴了，它变得空前的繁富，绚丽多姿，无所不至，仿佛一只乘风而起的鲲鹏。采摘香草、服用香花是奇丽的比喻，九嶷山的陈辞、昆仑山的登天，以及求索神女、飞龙驭天也都是比喻，大小比喻构成楚辞特有的雄奇瑰丽的象征系统，喻示出一个

非凡人格梦幻的精神求索历程。

不必太相信前人“依《诗》取兴”的说法，好像屈原写诗时，心里横着一个《诗》三百的比兴样板，模仿之，超越之。《离骚》等作品在比兴形态上与《诗》的显著区别，可以让人相信，那完全是根植于另外的文化、文学的传统之上的东西。心里横着一个榜样，不会有那样大的不同。而且，香草美人的繁富的比喻，还只是屈原作品在比兴上的一部分，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艺术，在想象力上更大的突破，是将神话传说等援入到情感的表达中来。蒋天枢先生在其《楚辞新注导论》一文中，将《离骚》的“托兴”分为“物”与“事”两个层面，“所谓物之义，不外于鸟兽草木虫鱼，而神话本身则‘事’也。”将大量的以昆仑山为中心的神话传说内容，写到诗歌中来，构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想象世界，这实在是空前的，某种程度上也绝后的，大大扩张了诗歌的表现力。蒋先生作那样的区分，是想进而从这“事”的一面，阐发出屈原“使楚成就一番帝业之理想”。这样去理解《离骚》的兴寄固然可以，不过笔者认为更重要的，是屈原借助昆仑山传说的驰情入幻，为中国诗歌在表现手法上，凿通了上天的梯阶。

要知道，见于《离骚》中使用的神话传说，多与古代神仙家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有关。神仙家的起源非常古老，甚至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时期^①。各种文献及地下出土文物显示，这一追求长生不老之古老宗教，在南楚之地多有保存。生长在楚地的屈原，自然深受其影响。《离骚》的后半部分就采取了许多神仙家传说来完成其文学意象的构造。首先是昆仑山，《离骚》和《九章》都曾提到这个

① 考古工作者曾在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发掘一座时间属仰韶文化早期的古墓，墓主人陪葬品有用石子码成的龙虎图案，专家据此认为，墓主人是可以骑龙虎之物上天的道士。

神秘的地方。《淮南子·地形训》说：“禹掘昆仑虚以下，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璇树，不死树在其西。”要注意，昆仑山是一个生长着“不死树”的地方。再有《离骚》中“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阊风而縻马”之“白水”、“阊风”，它们也属于传说中昆仑山的一部分。王逸《楚辞章句》引《淮南子》：“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又《地形训》：“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即“阊”）风之山，登之不死。”还有那个“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的“苍梧”和“县（悬）圃”，《文选五臣注》吕向说：“苍梧，舜所游，言朝夕远游神仙之官。”照此说法，苍梧也是仙山。实际上，传说中的“五帝”，都是得道长寿之人，否则道家就不会托言黄帝，中国古代的医学宝典也不会取名“黄帝内经”了。至于那个“悬圃”，据《淮南子》，更是一个“登之乃灵”、“乃神”的“太帝之居”，为昆仑仙山的最高山。屈原精神所到的灵地，原来是长生不老的神仙世界。昆仑山如此，《离骚》登昆仑追求失败后的“求下女”，又何尝不如此呢？在我国古老的成仙追求中，有所谓御女成仙术，是众多的成仙办法之一。古代的仙家以御女作为成就长生的工具，屈原的诗篇中，以求女来表现他的政治追求，《离骚》中的求宓妃、求简狄、求二姚等，在思路，上，都可以视为沿用仙家教义的表现。

但是，这里绝不是说，屈原在宣扬仙家的长生之教，而是说，诗人在表现内心的苦痛，在展示其精神的追求，在他驰情入幻的艺术思维中，他借助了古老的宗教的思维图式。这是理解屈原作品的关键。人们一般称楚辞为浪漫的诗歌艺术，然而这浪漫精神的成就，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一种古老长生宗教的借重。古老的神仙家，是一个很具有生成力的宗教。它是春秋战国时代道家思想的主要源泉之一，它那超世脱俗的登遐、飞升的种种美妙传

说,又很可以为文学的想象力量接生出长长的翅膀。将文学的想象,与古老的神仙传说连接起来,融铸为一种崭新的文学,正是屈原开天辟地的大功。因着《离骚》,人们的文学想象,始有上达天际的航图。一个直接的结果是“游仙诗”的出现。《离骚》不是游仙之作,但游仙诗,却是受《离骚》启发而生。实际上游仙的题材在屈原身后不久就开始了,那就是《远游》的出现。尽管有着许多的前辈,从各方面证明《远游》为屈原手笔,但还是难以令人置信。篇中出现了韩众,也就是韩终,这位仙人是秦始皇时成的神,如何会被屈原写入诗中呢?《远游》之后,游仙之作有东汉的乐府诗,有曹操、曹植父子的抒情诗,有阮籍的咏怀诗,更有东晋郭璞以“游仙”冠名的篇章。到了唐代的李白,篇篇都饮酒,饮酒就上山,上山就遇仙,那样一个想象力非凡的诗人,仔细推究一下他的想象力的边际,仍没有脱离屈原所开辟的浪漫理致。原来文学的想象力是有文化的国界的!开辟了中国诗歌艺术想象力的世界国土的正是屈原。

本书所选,以屈原作品为主,同时选了宋玉、贾谊、淮南小山的作品。旧题屈原的一些作品,今天看来不一定是屈原所作,因其思想性艺术性都不错,而且对了解诗人有重要价值,如《卜居》、《渔父》,自然都入选了。有的作品,如《远游》,过去的选家一般不选,理由是内容宣扬神仙家思想,且有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之嫌,但此书还是选了。《远游》是否抄袭《大人赋》,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更重要的,它是古代游仙题材诗歌开创性的作品,从文学史的角度说,有其特定的价值,因此予以选入。

在所据的版本上,本书主要依据明代复制的宋刊本《楚辞补注》,同时参考了其他一些重要注本。释义上对今人著作,如马茂元《楚辞选》、游国恩《离骚纂义》、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汤炳正

12 楚辞选译

等《楚辞今注》多有采撷,考虑到阅读的简明,注释中未一一标明,在此一并致谢。

注释中一定还有不少的谬误,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李 山

2004年春